


歷史的見証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二〇〇七年九月

历史的见证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
纪念新四军成立 70 周年
纪念浙东重建四明主力武装 60 周年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2007年 8 月

书 名: 历史的见证

委印单位: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承印单位: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制数量: 1000 册

印制日期: 2007 年 8 月

准印证号: 浙内图准字[2007]14 号

前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又是新四军成立 70 周年,浙东重建四明主力武装 60 周年,宁波籍也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的回忆,记述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活动和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的老同志、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的老同志的回忆,内容生动,是历史的见证,许多是第一次发表的,也有一些补充了重要的史实,特辑如下,附有照片,作为纪念。

目 录

- 一、我在南昌起义前后 竺 杨 (2)
- 二、红一师黄古林战斗旧址 (11)
- 三、铁军精神哺育成长的浙东纵队
..... 唐 炎 鲁 兵 林 晖 (15)
- 四、亲历华丰受降 林 晖 (61)
- 五、山好 水好 人好 难忘三北抗日根据地
..... 张 敏 (73)
- 六、在风暴中成长 肖 强 (85)
- 七、留下革命火种 再次燎原浙东 大 地 (271)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南昌起义 80 周年，奉化参加南昌起义的有三人，俞佩钦（在起义后会昌战役中牺牲）、裘古怀（在负伤后回浙江工作被国民党在杭州杀害）和竺杨同志。竺杨同志（1910.4.27—1994.4.17）。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在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当学生兵，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并在战役中负伤。一九三〇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回宁波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三七年十月，竺杨与朱镜我共同恢复重建宁波地区党组织，先后任浙东临特委委员、奉化县工委书记、宁绍特委委员、宁波中心县委书记、宁属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一九四一年调苏中工作，四二年后，又调回宁波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宁波日本宪兵逮捕，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方得以脱险，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一九四五年四月赴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六年随军北撤山东解放区，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任山东省工商总局科长、胶东县工商局局长等职，解放后，他先后在华东新建运输公司、利民公司任经理等职。一九五二年调入上海海运局，历任局职工业余大学副校长等职。一九七一年十月到龄离岗。八一年改为离休。

我在南昌起义前后

竺 杨

参加革命 迎接北伐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为我国革命史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一年,我从家乡奉化到宁波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一中)求学。在军阀统治下,地方反动势力也十分猖獗。校长经亨颐,因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斗争,被迫离职。为此,学生们闹学潮,开展挽留经校长的运动;同时,继续开展抵制洋货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也加入了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6年春,二年级同学曹声洪介绍陈尧和我参加国民党。相隔一个月后,由沈鼎鸿、陈尧介绍我加入共青团。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第四中学采用二、四学制,初中部是分设

在外的分部。我们读二年级时，已成为分部的主要活动分子。

10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响应北伐。我们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可是，夏超独立仅一星期时间就失败了，我与陈尧、李恭亭、沐虞祥、侯xx五人被校方开除了学籍。

我被开除学籍后，即回家乡竺家，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了哥哥竺一平等为党员。但团员介绍别人入党，不符合手续。不久，中共宁波地委派委员竺清旦前来考察，认为这几个人具备入党条件，就由他做入党介绍人，并帮助建立中共竺家支部，支部书记竺一平，党员发展到10余名。

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宁波后，我的哥哥竺一平被宁波台农民协会委任为驻奉化特派员，后又任国民党县党部农工部长。3月，长寿（江口）区农民协会成立后，我又回到宁波省立第四中学读书。那时，宁波学生联合会主席谢广祥与刘沧海到武汉去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由我代理宁波学联主席。我们在宁波地委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罢课等活动。

这时，国民党右派的面目日渐显露，蒋介石派了亲信王俊担任宁台温防守司令。阻碍了革命的道路。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22日，刽子手杨虎、陈群来宁波“清党”，杨眉山、王鯤、胡焦琴、甘汉光、陈良义、吴德元等同志被杀害了，许多同志被捕。我在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撤退到武汉，才幸免于难。

武汉参军 负伤致残

我与同学李恭亭、陈哲及我的哥哥竺一平撤退到武汉后，住在江浙流亡同志招待所，参加由张秋人（曾任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牺牲）主办的训练班，学习了约一个月。“七·一五”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形势危急。大部分同志都转移撤离，竺一平、李恭亭、陈哲等同志也回宁波了。我和奉化团员俞佩钦、宁波工人党员柴水香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当兵。几天后，部队就离开武汉东征到江西南昌。



竺杨同志“八·一”南昌起义负伤后，由他哥哥竺一平接回上海。图为养伤期间拍摄的照片，从左起分别为竺一平，竺母、竺杨。

“八一”南昌起义时，教导团当时还没领到武器，隐蔽在一所学校里。听到枪声，我们呐喊着冲出去，缴获到大量的武器。教导团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有党、团组织，政治素质较好，虽缺乏军事知识，但战斗力还是较强的。

几天后，部队开始南征。在征途中，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军事基本知识，如武器使用，利用地

形、地物等。还经常上政治课，由连、排长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几首歌。路上，曾听过周恩来、恽代英同志的报告。

南征到福建长汀时，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周恩来、朱德、贺龙、郭沫若等出席大会。我们听了他们的报告。

南征途中的第一仗——会昌战役，与桂系黄旭初部队作战时，我的脚踝部负轻伤，由于连续行军，也得不到什么治疗，伤口一直没长好。在涉过一条有腐尸的小河时，伤口感染了。10月初，潮汕战役，我部队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被打散。

潮汕战役失败后，我们聚集30余人，在农村流动。10多天后，遭遇薛岳的新编第二师的一个连，我们全被收编入该连。几天后，我伤口发炎，就病倒了，被遗弃在一个庙里，到第三天，才来人把我抬到汕头的红十字医院。医生拿了一桶石碳酸水进行处置，见我脚上烂糊糊的一片，操起剪刀就剪，我立刻痛昏过去。后来，我们10余名伤员送到师部临时后方医院。我在熬过10多天的剧痛后，写信给家。我哥哥竺一平来汕头接我。

我哥哥把我接到上海时，奉化流亡来沪的党员告诉我们，中共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被捕了，党员名单被敌人抄去，党组织被破坏；敌人去抓竺一平扑了空，正在通缉他，不能回奉化去。那时，我已残废，只得回家养伤。到1928年夏天，伤势好转。秋天，村里农民领袖竺乾封被捕，我被迫逃亡上海。

地下斗争 出生入死

1929年春,上海党办了华南大学,我由江闻道介绍,到华南大学求学。几个月后,学校被查封,我们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护校斗争。后来,我因伤病未愈,由江闻道介绍到宁波公立医院治疗半年多,伤仍未愈;再次回到上海。

在上海,正碰到沙文汉(解放后曾任浙江省长)从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会议回来,我们就住在一起。他给我恢复了团的组织关系,我在沪西区团委担任部分油印工作。立三路线时,准备搞暴动,组织工人纠察队,进行武器使用训练。立三路线纠正后,党组织拟调我到印刷所工作。因我正在医院动手术,来联系的同志约好待我出院再来联系。我匆忙出院,久等无人联系,我又失去了组织关系。(以后遇到沙文汉,才知印刷所已被敌人破坏了。)

失去关系后,我回到家乡。当时,乡里正由失掉关系的同志陈秋谷、赵国忠在组织雇农增加工资的斗争。我将上海团委发的文件给他们看,并配合他们把本村的雇农也发动起来。本村地主去告发,第二天,10多个反动武装警察来逮捕我们兄弟俩。在农民的掩护下,我俩逃出来,再度回到上海。

这次回上海,与奉化流亡在沪的党团员组织了“励社”。我与朱兆安、徐涨元在东余杭路泰昌里开办了上海学园(小学),我在那里当教员。1931年8月,我由朱、徐介绍入党。开办学园,作为流亡青年接待站和活动联络点,办工人夜校,宣

传革命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们积极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人剧团、歌咏队等，进行宣传活动。一次，我带领学生在提篮桥附近进行街头宣传时，被日本巡捕抓进提篮桥巡捕房。与我同去的沪东区委宣传委员，马上组织学生在巡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我。由于学生的抗议示威，4小时后，我被释放。当时，我们上海学园成了虹口区教育界抗日后续会主要支柱之一。

“一二·八”沪战爆发；虹口虽是公共租界地，但已是日军的所在地。学校停办，大部分同志转移，仅我与朱兆安两个坚持活动。不久，党发觉朱另有秘密活动，开除了他的党籍。当时，我还没看出朱会有这样严重问题，受到区委书记批评，说我是折衷主义。朱也离开了学校，我仍坚持活动，组织工人自救会，动员工人参加义勇队，赴前线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发行书刊宣传品等。这所虽是很小的小学校，但在抗日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沪战快结束时，党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我响应党的号召，又回到了家乡。

坚持抗日 重新建党

1933年我回乡后，到鄞县前周小学当教师。自1932年宁波党的特派员扬仁梓叛变后，宁波及所属各县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我因伤口未愈，行动不便，开始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

活动,联络了一些同志和进步青年,搞些快报、介绍进步书刊等宣传工作。

1935年,前周小学校董周华亭老先生,见我的伤一直不愈,介绍我到上海教会办的医院去治疗。我拖了8年的伤才长好了。返回后,我扩大范围,联络老同志进行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宁波的周康靖告诉我,宁波进步青年在组织人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也开始发动组织进步青年去陕北。我去找陈秋谷时,他与鲍浙潮、周楚琛都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在鄞县鸣凤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有一定的基础。在交谈中,鲍浙潮认为,组织青年到延安是好事,但不能把宁波地区丢掉,应当就地开展工作。我同意他的意见,决定留下来。

我原已决定去延安,所以把教师工作辞掉了。决定留下后,没再去找职业,就脱产进行革命活动,四处联络老同志。9月间,闻朱镜我已回家来养病。他是我的华南大学的老师,曾任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后被捕,抗战前夕获释出狱。我与鲍浙潮、周楚琛找到他,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活动情况,他认为国难当头,失去党组织关系的老同志,不应坐待,应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他肯定我们的方向是对头的,并提议去找上级党联系。我们一致赞同,商定在未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前,暂由我们五个人自行成立“宁波临时特别支部”,推朱为书记。开始朱要我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找潘汉年,后因事关重大,由他亲自抱病去上海。

朱镜我在上海与潘汉年联系上后，经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批准决定：恢复朱、竺、鲍、周、陈党籍，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我们五人为成员，朱为书记，撤销自行组织的“宁波特支”。此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又委托从南京监狱营救出狱来浙的同志带信给朱镜我，要求他把浙江党组织都恢复起来，并把知道的党员名单(包括尚在狱中的)汇报上去。

浙东临时特委建立后，我们就有计划地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组织，扩大抗日队伍。我们利用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势，鲍浙潮以乡公所事务员的身份，争取国民党鄞县县长陈宝麟同意，组织了抗日团体“飞鹰团”。11月间，举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即飞鹰团训练班)，吸收了鄞、奉一带失去关系的原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训练班上，我们恢复了邬仁扬、孙建刚、竺一平等7个同志的党籍，发展了秦加林、陈冠商、詹步行等8个新党员。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赴各地，组织群众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训练班外，我又发展了朱一伦、吴唐华等一批新党员，恢复了庄禹梅、唐仲明、卓子英等人的党籍。

我们以发动群众团体等形式开展斗争，从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先后建立了鄞东、鄞南、城区三个区委。在奉化、镇海也分别建立了几个支部。

1938年2月，朱镜我调到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宣教部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到1938年5月，宁属各县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上级党决定撤销浙东临时特委，成立中共

宁绍特委,同时成立各县县委或县工委。我们建立了鄞县、慈溪县委和镇海、奉化、宁海县工委。当时,与定海、象山失去联系。我移交了在鄞县等地的工作后,任奉化县工委书记。10月,我调任宁绍特委委员,分管宁波所属各县,领导宁属各县的工作,由我担任书记。以后,宁绍特委分为宁属、绍属两个特委。我任宁属特委组织部长。

1940年10月,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东南局召开的浙江省各地组织部长会议。会上,传达了我党白区工作“隐蔽精干”的方针,把党的委员会制政为特派员制,暴露的“红”的干部要转移。

回到宁波,传达了会议精神。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提出,我在宁波已很“红”,又是拐子(脚部受过伤),眼睛又有毛病,体征很易认,特委决定我转移去上海。

在上海,我找到了沙文汉。上海党组织安排我撤退到苏中根据地。1941年4月,日寇侵占宁波地区,我的长子在慈溪晋群小学读书辍学,到上海找我。7月,我就带他一起到苏中,由苏中区党委分配我父子的的工作。从此,我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红一师黄古林战斗旧址



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7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领导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工作。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为贯彻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即委派大革命时期余姚党支部的共产党员史济勋回到余姚，与中共余姚县委和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余姚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取得联系，酝酿以原余姚县纠察队部分队员为基础，组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准备在姚北组织武装暴动，以策应全国总暴动。7月下旬，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又派罗希三、徐云千等人携带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到余姚坎墩与费德昭等人会合，并根据江

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的决定，于7月底在坎墩成立了由史济勋、费德昭、洪传扁（中共余姚县委副书记）及罗希三、徐云干等人组成的“军事行动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

1930年8月初，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委派代表到余姚坎墩，宣布总行动委员会指示，将这支暴动队伍正式命名为“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简称红一师），任命费德昭为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扁为政治部主任，罗希三为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胡尧田（中共余姚县委委员）为农运部长。为加强党对红一师的领导，师部成立了中共临时支部，史济勋兼任书记。师部设在坎墩六灶庵。红一师下设第一、二、三3个营，营以下设连、排，共有指战员100余人，配有长短枪40余支，其余均为刀矛等武器。指战员无统一着装，夜间行动时以手臂扎上白毛巾作为识别记号。

红一师成立后，一面宣传发动群众，举办农民识字班，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一面积积极开展各种武装游击活动，按照军事行动委员会制定的“避实击虚，伺机袭击地主武装，缴获敌人武器，装备自己”的先期行动指导原则，袭击地主劣绅武装和乡镇警察所，收缴其武器，镇压反动分子，壮大红军队伍。当时，宁波《时事公报》、上海《申报》频频报道红军活动消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十分惊恐，调省保安第六团陈鹏举营由杭州乘快船到姚北，会同当地地主武装一起进驻坎墩，“围剿”红一师。